

丛书常务编辑 王有为
丛书封面装帧 范一辛
本书责任编辑 胡小静

· 中国文化史丛书 ·

周谷城 主编

楚 文 化 史

张正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8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插页 11 字数 215,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内精装本 2,500)

书号 11074·749

定价 平装本 4.80元 精装本 8.35元

《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谷城

编 委(依姓氏笔划为序)

王 尧	叶亚廉	包遵信	刘再复
刘志琴	刘泽华	朱维铮*	纪树立
李学勤	李致忠	张 磊	张广达
金冲及	金维诺	庞 朴*	姜义华
陶 阳			

〔有*号者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编者献辞

以悠久、丰富、灿烂见称于世的中国文化，哺育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华民族。

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化，为人类的进步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珍藏。

今天，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新的纪元；世界上过度物质化了的国家，重新又把它们的目光投向文明的古邦。

于是，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论它的千秋功过，规划它的锦绣前程，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这套丛书，因此诞生了！

我们设想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诸如区域文化，民族文化，考古学文化，科学工艺，生活起居，思想学说，语言文字，艺术文学，体育武术，宗教神话，文化制度，文化事业，文化运动，文化交流与比较等等。

当然还需要综合性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期待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通史著作问世。在这以前，以体现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特色为宗旨的一系列著作，也将列入我们的丛书。

既称丛书,又受作者、编者和出版者各种条件的限制,内容自然难免不齐。我们企求在不齐中略见一致,所以争取在五年内先刊行五十种,以期初见系统性。但愿我们的初衷,十年刊行一百种,能够实现,那时读者也许会觉得这套丛书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了。

任何关于编好出好这套丛书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都竭诚欢迎。

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

1984年10月

导 言

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它同东邻的吴越文化和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区域文化之花。

当楚文化迹象初露之时，它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特色还不多，水平还不高，几乎无足称道。春秋中期是楚文化际会风云之时，从此，它便领异标新，而与中原文化竞趋争先，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个交融、衍生、勃兴、转化的过程所体现的文化演进规律，是引人入胜的。

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遥相辉映。

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随着资料的增多而加深。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人们所知道的楚文化只是哲学上的老、庄和文学上的庄、骚，虽极玄妙、奇瑰之能事，终究象瓶中的无本之花。至于把有限的传世文献和无限的出土文物结合起来，对楚文化作全面的研究，则是在近半个世纪内逐步推进的。

从1933年到1938年，位于安徽寿县李家孤堆的楚幽王墓

三次被盗掘，出土文物数以千计。其中有些文物经收藏者公之于世，引来学术界的关注，成为楚文化这个学科诞生的契机。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湖南长沙市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帛书“月令”一件。四十年代末，长沙市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一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楚文化的研究仅限于利用非科学出土的文物，做些楚器鉴别和楚字考释之类的零星工作。

1951年冬至1952年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在长沙市发掘了战国楚墓70余座。1952年间，由中南文化部主持，在长沙市发掘了春秋战国楚墓150余座。从此，才进入了对楚文化的遗存作科学的发掘并且对楚文化的性质和面貌作深入研究的阶段。

五十年代，发现楚文化遗存最多的地方是长沙市。此外，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了战国中期的鄂君启节四枚（按，1960年在该地又征集到一枚），1957年和1958年在河南信阳县长台关发掘了战国中期的大型楚墓两座，也是五十年代楚文化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六十年代，故楚郢都纪南城所在地湖北江陵县，成了探寻楚文化遗存的中心。从江陵县太晖观、张家山、葛陂寺、拍马山、望山等地的楚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

七十年代，在比以前更广的范围内发现了比以前更多的楚文化遗存。湖北当阳县赵家湖发掘的西周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楚墓297座，江陵县雨台山发掘的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558座，河南淅川县下寺发掘的春秋中期至晚期的楚墓25座，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的周代的铜矿冶遗址，以及湖北随州市擂鼓

墩发掘的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对于认识楚文化的内涵都是至关紧要的。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过反复比较和多次修正，基本上建立了东周楚墓的年代学序列，并且大体上认识了东周楚文化的考古学特征。

八十年代的前半期，楚文化遗存的重大发现，首推江陵县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刺绣珍品。

可以预期，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持续进展，今后必将有更多的楚文化遗存面世。

当考古工作者为楚文化遗物拭去历史的尘垢，使它们重见天日之时，纷华照眼，令人有美不胜收之感。考古工作者的发现，为一切有关的学科加入楚文化研究的行列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所谓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说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使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正是凭借着它的六根支柱营造成功的。

楚文化的渊源，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楚文化的发展阶段，以及楚文化对后世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曾作出的贡献，都是正在探讨中的饶有兴味的课题。本书所介绍的，自然

只是作者的见解,或许幸而言中,难免也有言而不中的。我们在撰写此书之时,为楚文化辉煌的成就所激奋,为楚文化深广的遗泽所鼓舞,情蓄乎中,发而为言,不吐不快,如此而已!

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除张正明外,有:

涂又光,撰写第四章第六节和第五章中有关哲学的段落;

刘彬徽,撰写第三章第五节之“二”和第四章第八节之“一”;

王胜利,撰写第一、二章中有关天文和历法的段落以及第四章第五节;

郭德维,协助审订某些考古资料。

1985年12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楚文化的渊源	1
第二章 滥觞期的楚文化	15
第一节 筮路蓝缕的历程	17
第二节 从荆雒山区到江汉平原	23
第三章 茁长期的楚文化	33
第一节 楚文化勃兴的特殊机遇	36
第二节 楚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	41
——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	
一、楚式的陶器是夷夏相变的成果	42
二、火耕水耨和筑陂灌田盛行于夷夏错居地区	45
三、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铸技术而兼之	51
四、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60
第三节 红铜和青铜	64
一、采掘和冶炼	65
二、铸造和焊接	76
第四节 楚器的风格	83
一、礼器	85

二、兵器·····	90
三、乐器·····	94
第五节 夏化的楚言和楚式的夏字·····	98
一、夏化的楚言·····	98
二、楚式的夏字·····	101
第六节 楚人的习俗·····	104
一、尚赤,尚东,尚左·····	105
二、念祖,爱国,忠君·····	108
三、崇巫·····	112
四、知音·····	120
五、层台累榭和长鬣细腰·····	124
第七节 浸润江淮·····	131
第四章 鼎盛期的楚文化·····	135
第一节 铜器和铁器·····	140
一、青铜冶铸业的技术进步·····	140
二、青铜器品种的发展趋势·····	146
三、青铜器风格的演变趋向·····	153
四、铁器的提高和普及·····	156
第二节 丝织和刺绣·····	159
一、丝织·····	161
二、刺绣·····	172
三、花纹的风格·····	173
第三节 木雕,竹编,漆绘,以及料器生产·····	184
一、木器·····	184
二、竹器·····	199

三、漆器的生产工艺·····	202
四、漆器的装饰艺术·····	204
五、料器生产·····	208
第四节 城市和商业·····	210
一、城市和建筑·····	210
二、商业和货币·····	217
第五节 天文和历法·····	225
第六节 哲学·····	234
一、鬻子哲学·····	235
——关于楚国早期道家的传说	
二、老子哲学·····	240
三、庄子哲学和屈子哲学·····	246
第七节 文学·····	252
一、庄周与散文·····	253
二、屈原与诗歌·····	257
第八节 字和画·····	264
一、字体·····	265
二、帛画和壁画·····	268
第九节 乐舞·····	271
第十节 世俗与神灵·····	283
一、楚人的日常生活·····	284
二、楚人的特殊信仰·····	294
第五章 滞缓期和转化期的楚文化·····	301
第一节 滞缓期的楚文化·····	303
第二节 转化期的楚文化·····	314

楚文化是在江汉地区诞生和成长的，但它的主源不在江汉之间。

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传说中的三苗。《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说：“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吴起是战国初期的人，那时的彭蠡应即今鄱阳湖，那时的洞庭应即今洞庭湖。至于文山和衡山的地望，古今学者多所考证而莫衷一是，不外乎两种情况：若非名称先后相异，则必方位南北互倒。总之，一个应在彭蠡、洞庭之南，一个应在彭蠡、洞庭之北。按吴起的说法，江汉地区正是三苗的腹地。

三苗，别称“有苗”或“苗民”，是一个庞杂的族系。三苗的“三”，恰如九黎的“九”，是说他们族类纷繁、部落众多。因此，三苗的文化遗存决不只有一种。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大溪文化和较晚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更晚的石家河文化，都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遗存。《山海经》里多处说到三苗，所居之地不尽相同，在南的多，在西的少，原因也在于族类纷繁。

远古之世，江汉地区的部落流徙不定。在不同族类之间，此退彼进，此消彼长，是常有的事。反映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上，便是先后两种文化之间未必有内在的传袭关系。屈家岭文化虽晚于大溪文化，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从大溪文化脱胎而来的。至于后来的楚文化，就更没有证据说它是在石家河文化或屈家岭文化的母腹里孕育成形的。

楚文化的主源，应该到楚人的先民祝融部落集团那里去找。因此，无论空间和时间，我们都不得不从远处说起。

《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说，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可以从楚国的祀典中找到确凿的证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祀祝融和鬻熊（鬻熊是楚君的先人），楚人以为大逆不道，举兵攻灭了夔国。由此可见，在楚人的心目中，祝融有着何等崇高的位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郑，祝融之虚也。”当年的郑，在今河南新郑县，位于中原腹地。据《国语·郑语》所记，祝融的后裔有八姓。李学勤考证祝融八姓分布在中原，其说大致不误。^①

《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还说，祝融是高辛的火正。高辛，即帝喾，即帝俊，即帝舜。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高辛与祝融之间传说的君臣关系，反映了两个分别奉高辛和祝融为始祖的部落集团之间的主从关系。这个主从关系给祝融的后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楚人在所有古帝中特别推崇高辛。长沙市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有“帝舜乃为日月之行”句。帝舜，即高辛的别称帝俊。显然，楚人把高辛尊奉为宇宙的主宰了。

祝融既是火神，也是雷神。在楚辞中，雷神是丰隆，号为云中君。古无轻唇音，今读轻唇音者，古读为重唇音。祝融和丰隆，

^① 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其声相近，都是状雷声的词。《国语·郑语》记西周末期郑国的史伯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这里，史伯所赞扬的，实为雷神。屈原所作《九歌·云中君》对雷神的描写，有“烂昭昭兮未央”，“与日月兮齐光”，以及“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等，与前引史伯的话比照，实同出一辙，几乎只有诗歌化与散文化的区别。

楚公逆罇所记的吴回，也是一位祝融，回字写作雷字，应以雷字为正，回字是雷字的简体，这也说明祝融又是雷神。

祝融这位火神兼雷神，地位与日神相近。还是那位史伯说：“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地上的火堆，天上的火球，都能给生物带来光和热。但能“生柔嘉材”的，却只能是天上的火球太阳。

古人所认识的天界之火，除了永存的太阳、偶发的雷电，还有火星。这火星，所指的不是被称为“荧惑”的行星，而是被称为“大火”和“鹑火”的恒星。祝融之所以为火神，与“大火”、“鹑火”这两颗星也有牵连。

农事讲究时令，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切以时令为转移。至于时令的更换，则由天象的变化来判别。上古之世，火正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观象授时，即观测大火和鹑火的星象位置来确定农时。古人观测星象，主要是在天空刚变黑的黄昏时候进行的。被观测的星，如刚从东方升起，叫“昏见”；如刚在西方落下，叫“昏伏”；如恰在南方正中，叫“南中”。

大火是一颗一等星，西名为天蝎座 α 。在中国古代的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大火是心宿的第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古人以“心”、“火”的美称为它命名，是因为它有与众不同的鲜红颜

色。中原地区的春耕、春播，以始于春分前后为宜。当高辛之世，大火在春分前好多天就昏见了。这时，中原的人民该放火烧荒以备耕种了。而把妥善地保存了一冬的火种引出来，并且点燃烧荒的第一把火的人，应为火正。《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为焚也。”说的虽是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出火烧荒的生产习惯应是在远古形成的。季秋时节，大火昏伏之后，还要举行仪式，把火种收起来，叫做“内火”。

由于岁差，大火昏见的日期逐渐推迟。在公元前 2300 年左右，即约当夏代的中期，大火昏见恰在春分时节。再往后，到商代，大火在春分后好多天才昏见。如果等到这时才去刀耕火种，就太迟了。为了不误农时，火正不得不把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南中了。鹑火原名昧，即二十八宿中的柳宿，是一群形如鸟喙的暗淡小星，西称属于长蛇座。在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即约当商代的中期，鹑火南中恰在春分时节。昧星本来与火毫不相干，它之所以也以火见称，想必是因为火正把它的南中当作出火时节到来的标志。高辛的火正是黎，其兄是重。《国语·楚语下》说：“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重和黎，其实都是火神，不过一个管天界之火，一个管人间之火罢了，可以合称为重黎，二而一，一而二。《左传·襄公九年》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昧，以出内火。是故昧为鹑火，心为大火。”说的是火正观测对象的演变，起初观测大火，后来观测鹑火。所谓“或食于心，或食于昧”，其实是有先后之别的。

由此可知，楚人的先祖是我国古代最早知名的天文学家，他

们观象授时的丰富经验,是直接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服务的,因而后来的火神就兼为农神了。

楚人的先民以凤为图腾,说详《凤斗龙虎图像考释》。^①降至春秋战国之世,在楚人的意识中,作为图腾的凤只剩下朦胧的回忆了,但仍有图腾的某种象征作用和某些神秘意味。在楚人看来,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他们对凤的钟爱和尊崇,达到了无出其右的程度。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数不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楚人的凤,虽有多种多样的体形和姿态,但都显得雍容华贵、伟岸英武。楚人以为,只有在凤的导引下,人的精魂才得以飞登九天,周游八极。所以,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庄子·逍遥游》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鹏,就是大风。

凤的原型,应是一种或几种凡鸟,山雉大概是主要的一种。《尹文子·大道上》记着一个故事,说一个楚人错把山雉当做凤,高价买来,要献给楚王,山雉虽死于途中,楚王仍给此人以厚赏。这个故事不发生在别国而发生在楚国,决非偶然。凤的原型,当然不会有凤那么美,那么大,那么神。楚人把凤设想成我们现在从楚国文物上所看到的那些模样,无非因为他们相信凤与他们的祖先有某种亲缘关系,所以把自己认为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给了凤。他们尊崇凤,就是尊崇自己的祖先;他们钟爱凤,就是钟爱自己这个民族。

先秦之世,唯独楚人好以凤喻人。《史记·楚世家》记楚庄

^① 张正明、滕壬生、张胜琳作,见《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王答进隐者之问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①在这个为后人所乐道的故事里，进隐者以鸟喻楚庄王，楚庄王则以鸟自喻。这鸟，蜚能冲天，鸣能惊人，想来是非凤莫属的了。《史记·孔子世家》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这是以凤喻孔子。《九章·怀沙》中写道：“凤凰在笱兮，鸡鹜翔舞。”这是屈原以凤自喻。《离骚》中写道：“鸞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所谓“鸞鸟”，实即大风。《文选·辨命论》注引高诱说“大风鸞鸟”，上古风、凤二字相通，大风即大风。在《离骚》中，屈原是以大风自喻的。

凤又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这是汉人的说法，当以楚人的传统观念为依据。一个是作为始祖之神的祝融，一个是作为始祖之灵的风，二位一体。

祝融部落集团所依附的高辛部落集团，也以鸟为图腾。帝俊的“夔”字，就是鸟的象形。^②楚人以凤为图腾，或许出于固有的信仰，但也可能是从高辛部落集团移植过来的。

文献所记夏朝的兴衰之迹，还不能说全是信史。然而，夏朝的存在已有某些遗址提供了可信的物证。《国语·周语上》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融即祝融，

① 进隐者，《史记·楚世家》说是伍举，《韩非子·喻老篇》和《吕氏春秋·重言篇》说是成公贾，《新序》卷二说是士庆。受谏者，上列四种文献都说是楚庄王。《史记·滑稽列传》所记独异，说是淳于髡进隐谏齐威王。按，《滑稽列传》记事多误，应为后人补作。楚庄王死后二百三十四年，齐威王始立，而《滑稽列传》竟说楚庄王后于齐威王“百余年”，其荒诞如此！淳于髡进隐谏齐威王之说，似不可信。

② 参考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见《历史论丛》，中华书局，1964年。